



联合国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Distr.
GENERAL

E/CN.4/1990/86
5 March 1990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

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
监禁的人的人权问题

1990年2月22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日内瓦
办事处代表给人权委员会主席的信

我谨在此附上外交和国防部长凯南·阿塔科尔先生阁下代表塞浦路斯争端主要双方之一塞浦路斯土族给您的一封信。

记得在人权委员会中曾作过一次关于塞浦路斯失踪者问题的发言，遗憾的是当时塞浦路斯土族的代表不在场。在这种情况下，塞浦路斯土族没有其他办法，只能以书面形式表示自己的意见，以便至少其意见能见于记录中。

如蒙按以往惯例将此信及其附件作为人权委员会会议项目 10 的文件散发，则不胜感激。

大 使

Cem Duna (签字)

附 件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外交和 国防 部

(Lefkosa, via Mersin-10 TURKEY)

1990年2月21日

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第四十六届会议主席

Purificacion V. Quisumbing 博士教授阁下，

阁下，

很遗憾，塞浦路斯希族一方，出于政治目的，经久不息地坚持以利用在塞浦路斯失踪者问题为其政策。正是这一政策阻碍了1981年为处理这一问题而成立的失踪者问题委员会完成其任务。

2. 该委员会是于1981年经双方协议后成立的，由三人组成，一人为塞浦路斯土耳其人，一人为塞浦路斯希腊人，第三名成员是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名由联合国秘书长任命的。现任第三位成员是瑞士一位前任著名大使，他从1985年5月一直任职到现在。

3. 确实令人悲叹且不无讽刺意味的是：一方面，作为非法的“塞浦路斯政府”的塞浦路斯希族一方，利用它能进入的每一个国际讲坛，在没有塞浦路斯土族代表在场的情况下，不断提出这个问题，毫无根据地指控“土耳其人”一方不予合作；另一方面，塞浦路斯希族一方则故意为委员会的工作进展设置障碍，看来是为了给其无根据的指控制造依据。

4. 塞浦路斯希族一方在此情况下经常把“塞浦路斯土耳其族”一方称为“土耳其人”，这是因为其政策是要利用这一敏感的人道主义问题来攻击土耳其，转移

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不去注意塞浦路斯冲突中两族之间的性质，不去注意在1963至1964年和1974年两族中都有人失踪这一事实。他们对这一人道主义问题采取政治手法的另一个证据是，他们决定不将1963至1964年发生的约五十名塞浦路斯希族人的失踪案件提交调查委员会，以便使之不与他们制造的关于塞浦路斯问题始于1974年所谓的“土耳其的入侵和占领”的神话相抵触。

5. 负责调查两族失踪者命运的塞浦路斯失踪者问题委员会实际上已为收集有关169个案件（60名塞浦路斯土耳其人和109名塞浦路斯希腊人）的资料作了大量工作。它从1984年起一直在进行调查。该委员会本应现已结束对这169个案件的调查，并开始调查双方的其他许多搁置的案件，但遗憾的是，它不能这样做，因为该委员会必须以协商一致意见采取行动，而委员会中塞浦路斯希族一方的代表却要求在结束109个塞浦路斯希族案件中任何案件和提出要求调查的任何新案件之前找到其中每个人的可鉴别的遗体，从而阻碍了委员会工作的进展。这一要求既非经商定的委员会职权范围中所规定，实际上在塞浦路斯的情况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我相信，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有关时期在塞浦路斯作出了重大贡献的许多有威望的代表也可以证明这种要求是不可能实现的。

6. 另外，委员会的塞浦路斯希族成员根据政治指示还阻挡向169名失踪者家属提供情报。而对这些人的案件自1984年以来已作了深入调查并收集了大量的有关情报。

7. 塞浦路斯希族将问题政治化的另一个证据是，他们通过他们在失踪者问题委员会中的代表拒绝同意该委员会发表一项能使人们了解情况、有意义的公报以说明委员会到目前为止所进行活动和遇到的实际困难。委员会到目前为屡次发布的一些公报十分简短、措词含糊、缺乏内容，这是因为委员会的塞浦路斯希族代表使用“否决”权。

8. 现附上委员会一项旨在使人们了解情况的新闻公报草稿作为附录一。由于塞浦路斯希族代表拒绝同意，这项公报从1989年夏天一直拖到现在未能发布。

他的借口是，这会给他造成困难，据说还会引起塞浦路斯希族失踪者亲属的反应。可是，这些亲属向委员会之外的人特别是向新闻媒介发表谈话的内容却正好相反。

9. 现将记者 Rachael Gillet 在 1989 年 7 月 21 日的《塞浦路斯邮报》上发表的一篇报道摘录一段如下。这篇报道清楚地证明了塞浦路斯希族一方对失踪者问题的不诚恳态度。Gillet 女士是根据她采访塞浦路斯希族失踪者亲属委员会主席 Christoforos 神父和失踪者问题三方委员会塞浦路斯希族代表的情况写成这篇报道的。

“委员会从 1984 年 5 月开始对第一批案件即 109 个塞浦路斯希族失踪者案件和 60 个塞浦路斯土族失踪者案件进行工作。五年以后，只定期发布了一些新闻简报而已，告诉人们调查仍在进行。亲属们对缺乏进展感到愤怒，指责委员会的工作受到太多限制”。

10. 值得注意的是，在记者 Gillet 的采访期间，实际上三方委员会因未能发布较有内容的新闻简报和未能向有关家属提供任何情报而受到批评；而这正是委员会中塞浦路斯希族代表一直所反对的！因为这篇报道中还载有另外一些这类无根据的指称，现附上这些指称连同塞浦路斯土族一方的简短评论作为附录二。认真和客观地分析一下这些资料，就不难看出塞浦路斯希族一方在政治意图驱使下对失踪者问题采取的手法。

11. 最后，我希望通过阁下的斡旋，争取说服塞浦路斯希族一方不要再从政治上利用这一不幸的人道主义问题，继续这样做下去只能延长数以百计的塞浦路斯土族和希族有关家属的痛苦；并确保塞浦路斯希族一方与委员会合作以便委员会能够按照人道主义原则、以失踪者家属的利益为重完成其任务。

顺致最崇高敬意。

外交和国防部长

凯南·阿塔科尔博士 （签名）

订正稿

1990年1月26日

新 闻 公 报

1. 失踪者问题委员会在其上一次公报(1989年10月25日)中提到所面临的一些困难。最近的情况表明公众很少了解委员会活动的现实情况以及委员会所面临困难的性质。由于受处理权限和保密规则的限制,委员会所公布的情况可能不够明确。

2. 委员会过去曾说明,其活动以下述两种基本资料为依据:

(a) 每一方提供的关于该方失踪者的档案和文件。

(b) 调查组会见的塞浦路斯希族和土族的证人提供的证词。

3. 委员会在此强调,它纯粹是一个人道主义组织,无警察和司法权力。实际上,这种权力完全与委员会的基本人道主义性质相抵触,因为它只涉及收集情报,而不归咎失踪应由谁负责。

4. 调查组是根据情况由塞浦路斯希族一方和土族一方组成的,并完全向双方负责。第三方成员及(或)其助手则参加访谈,提出问题以及作出调查所需要的实地采访。

5. 委员会面临的主要实际困难是,证人往往不愿或不能提供有关失踪者的全部情况。证人的充分合作对委员会是至关重要的。当证人不愿提供全部和确切的证据时,委员会就面临一个严重问题,因为这样它就不能掌握所需要的所有情况。虽然委员会成员对做出结论所需情报的性质可能有不同看法,但委员会一直认为,必须设法取得尽可能全面和确切的情报。

6. 证人不愿提供情报是令人遗憾的,其原因在某些情况下可以理解为,证人害怕连累自己或失踪的其他人,这些人可能已因暴力而死亡。

7. 委员会及其调查组一再告诉所有证人委员会和调查组对他们提供的情况将

严格保密，他们作为证人将不会受到任何形式的警方或司法机关的起诉。决定采取这一政策是为了使证人放心。

8. 在这方面，委员会郑重呼吁双方继续大力支持委员会的工作，以便使它能够以最良好的条件下完成其人道主义任务。在这方面的一大贡献是，委员会在其程序范围内普遍鼓励被接见的的所有证人提供他们所知道的所有情况。

9. 为了进一步消除证人的恐惧，给他们以最有效的保证，委员会正在研究采取一项措施，使证人不致只因为和失踪者问题有牵连和在委员会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向委员会提供了口头或书面陈述而受到司法和（或）警方的起诉（“赦免”问题）。

10. 另一因素则使委员会的工作复杂化，即时间的流逝（例如在15年或甚至25年以前发生的失踪）。有些证人由于上了年纪已不能确切记得与失踪有关的情况，另一些证人已出国或已死亡。

还必须记起的是，1963—1964年和1974年的失踪事件是在两国交战、内战和大混乱的情况下发生的。

11. 委员会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再一次提到，为了完成其任务和作出决定，委员会必须以协商一致意见采取行动，也就是三个成员必须一致同意。

12. 委员会充分理解亲属的极度痛苦和急切心情。显然，最好是设法减轻其悬念（即向亲属提供情况）。

13. 但是，也很明显的是，要根据所提供的证据作出结论，委员会必须对证据的价值持有共同见解。委员会现在还未达到这个阶段，而正在努力寻求一个必不可少的共同点。

14. 当然，亲属希望通过验明失踪者的遗体获得死亡的确定证据是普遍合理的，特别是从宗教理由来看。调查组已有系统地向双方调查塞浦路斯希土两族失踪者的遗体情况。但是，委员会没有从任何一方获得遗体情况，显然，也就不可能进行尸体验证。

15. 此外，委员会现已要求双方提供关于所有失踪者的全部档案。这样，委员

会将能够对整个问题的了解，因此，还希望得到各种迹象以帮助它结束第一批的 169 个案件，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双方的很多失踪者案件可能是互相连系的。

16. 总之，委员会必须在这客观存在的严重困难下完成其任务。委员会将尽一切努力进行一切必要的调查以获得有关双方失踪者的充分情报，并将调查结果尽早通知双方。

附 录 二

1989年7月21日《塞浦路斯邮报》发表的有关
在塞浦路斯失踪者的 RACHAEL GILLETTE 报告中的
指称和塞浦路斯土耳其族方面就这些指称作出的评论

指称事项(1): 土耳其并没有释放1974年事件之后被送到土耳其去的1,619名塞浦路斯希族俘虏。

评论(1): 国际红十字委员会1976年3月11日的声明中对此已予以否定。

指称事项(2): 塞浦路斯希族方面想知道失踪的塞浦路斯希族人是否死亡,是谁在什么条件下将他们杀害的。

评论(2): 迄今为止,塞浦路斯希族方面的态度并非如此。最近发生的 Kufi Azmi 事件也倾向于支持相反的观点。

指称事项(3): 塞浦路斯土族方面不让委员会开始其工作,直到塞浦路斯希族方面作出让步,同时也调查1963至1964年失踪的塞浦路斯土族人。

评论(3): 这是不真实和不公平的说法。肯定地说,塞浦路斯土族失踪者的家属的人权与塞浦路斯希族人的人权同样神圣。

指称事项(4): 在过去5年里,塞浦路斯失踪者问题委员会只定期发布了一些新闻公报,仅说调查仍在进行而已。

评论(4): 我同意。我一向建议,塞浦路斯失踪者问题委员会应发布较有内容的新闻公报。

指称事项(5): 范围狭窄,使调查不能在土耳其进行,这也是无进展的原因。

评论(5): 这一指称毫不相干。失踪者委员会必须在议定的调查范围内采取行动。当1978至1981年期间在秘书长的特别代表协助下制定调查范围时,对所有这些因素都做了考虑。从没有向失踪者委员会提出任何证据支持在土耳其有失踪的塞浦路斯希族人的说法。

指称事项(6): 1,619名失踪的塞浦路斯希腊族人的大多数最后一次露面是在土耳其。

评论(6): 说法不真实。

指称事项(7): 从土耳其透露出来的消息表明,一些失踪的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可能还活着。

评论(7): 尽管一再提出要求,但仍没有向失踪者委员会提出证据支持这种说法。

指称事项(8): 责成委员会调查1963至1964年期间塞浦路斯土族人的案件加重了调查过程的困难,延长了时间。

评论(8): 不真实也不公平。事实上,对1963至1964年期间塞浦路斯土族人失踪负有责任或至少肯定掌握情况的“主要行为者”已为人所知,他们的名字已交给失踪者委员会,并要求塞浦路斯希腊族成员的调查组对他们进行质问。情况是,被提出名字的人或者没有受到质问,或者似乎对一切都加以否认。

指称事项(9): 塞浦路斯土族人自己称他们有人失踪。1974年,国际红十字委员会说,有106个失踪的塞浦路斯土族人。塞浦路斯希腊族人占其中的97个。有96个是在Akrotiri的英国基地,后来被转移到土耳其,又从那里转移到塞浦路斯北部。第97人已死亡。关于其余9人,我们从来没有得到详情,因此无法调查案情。此后,塞浦路斯土族直到1976年再未提到过任何失踪问题。

评论(9): 这一指称是荒谬的,而且尊重一些说,荒谬到具有挑衅性。向一位记者说1974年只有9名塞浦路斯土族人失踪,而事实上就在同一记者的采访时,就有关于84名塞浦路斯土族人的Taskent (Tokhni)案件及其他3个案件共87人提交失踪者委员会供调查,因此,至少可以说,这是无耻的谎言。

指称事项(10): 塞浦路斯希腊族的协商一致意见是,把失踪的塞浦路斯土族人搅进来,Denktas先生搞了一个拖延战术,不让塞浦路斯希腊族发现他们自己人失踪的原因。

评论(10): 不对。这是极为不公正、有政治动机的说法。

指称事项(11): 塞浦路斯土族代表 Rustem Tatar 先生在 1985 年甚至说: “我们已经承认他们是死了, 只是我们想知道他们埋在那里。”

评论(11): 不对。

指称事项(12): 对塞浦路斯希族方面来说, 情况恰恰相反。他们将不会接受失踪者已死的说法, 除非见到他们的坟墓。

评论(12): 确实如此。这是取得进展的主要障碍。

指称事项(13): 另一个问题是, 不让塞浦路斯希族代表前往北部进行调查, 他不得不依靠联合国和塞浦路斯土族代表收集的材料。

评论(13): 毫不相干。他对失踪者委员会其他成员的人格产生了怀疑。

指称事项(14): 时间越久, 越难发现真相。在很多情况下, 证人已死, 其他人又很难找到, 有些人感到害怕, 或拒绝做证。

评论(14): 非常对。

指称事项(15): 很少有人怀疑委员会做了取证, 但它所做的任何取证都没有向公众或失踪者亲属发布。

评论(15): 确实如此。让我们来这样做吧。

指称事项(16): 进入土耳其调查至为关键。一旦调查范围扩大, 就有可能取得进展。

评论(16): 不相干。一如对指称事项(5)的评论。

指称事项(17): 必须允许塞浦路斯希族成员前往北部, 塞浦路斯土族必须准备让察看坟地, 以使法医专家能够对遗体进行研究。

评论(17): 不相干。议定的调查范围内没有这一点。这个目的有政治动机。

指称事项(18): 在将获释的土耳其俘虏名单中, 有一位美国公民 Andreas Kassapis, 在冲突结束后曾听说他还活在监狱里。

评论(18): 不对。从来没有一个“将获释的土耳其俘虏名单”。Kassapis 的名字出现在所谓的“学生名单”, 这些名单是根据家属通过联合国提供的资料编成的,

指出了一些塞浦路斯希族战士或俘虏的名字，并要求优先释放这些人，以使他们能在塞浦路斯之外继续完成高等教育。这些仍然活着和将获释的“学生”名单不是土耳其、甚至也不是塞浦路斯土族方面编成的，而是在一封由 Dr. Reme Gorge 签名的关于这个问题的信件中所证实的，当时他是秘书长派往塞浦路斯的特别代表的瑞士籍高级政府顾问。

指称事项(19)：为结束一起失踪者案所迫切需要的“决定性”证据，获得的可能性甚小。

评论(19)：如果“决定性证据”是指可辨认的遗体的话，则确实如此。

指称事项(20)：1974年曾收集到证据，证明敌对行动结束后一些失踪者仍然活着。近年来，证据集中于访问过土耳其或在那里被监禁后回来的人所说他们看到或听到有被监禁的塞浦路斯希族人。

评论(20)：如果确有这种证据，则应将其提交失踪者委员会。

指称事项(21)：收集到的以下证据表明仍有塞浦路斯希族人在土耳其监狱中。

- (a) 塞浦路斯土族公布的战俘名单和其中将获释的人员名单。有些如 Andreas Kassapis 从未获释。
- (b) 从照片上认出的人(Ergin Konuksever 的照片)。
- (c) 在 Bairak 广播电台上讲过话的人。
- (d) 后来获释的其他人在土耳其监狱中见到的俘虏。
- (e) 在英国广播公司 1974 年 9 月拍摄的电影中认出的亲属。
- (f) 退休将军 Demirel 对 Günaydin Kibris 的讲话中提到敌对行动结束一年后躲藏在山中的塞浦路斯希族士兵和军官。
- (g) 伊朗商人的讲话中提到他的侄子曾于 1975 年在土耳其狱中见到 31 个塞浦路斯希族俘虏。
- (h) 一对英国夫妇透露的情况，他们开车在土耳其旅行，在一个村庄里看到塞浦路斯希族人在采石。

评论(21): 这些声称或“证据”都没有提交失踪者委员会或被证实。 Ergin Konuksever 的照片里见到的国民卫队士兵不幸被不知名的塞浦路斯土族战士打死, 很可能是为了对他们自己的亲属死在塞浦路斯希族国民卫队的手中进行报复, 该卫队控制了那个地区并将塞浦路斯土族居民置于他们的武装占领和控制之下。 Ergin Konuksever 在对塞浦路斯的一次特别访问中曾亲自作证讲了这番话。

XX XX XX XX XX